

中国现代文学 的多重视野

王晓初

著



中国现代 文学的多 重视野

王晓初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 / 王晓初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3

ISBN 7-80148-979-9

I. 中... II. 王...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9813号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

王晓初 / 著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装帧设计: 林琳

责任印制: 韦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12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965 1/16

字数: 198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06年3月第一版 200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自序

本书是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的。第一个主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透视，包括第一个单元的3篇文章，其核心是现代性与现代文学之关系。如果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才刚刚走过半个多世纪，但是在这短短的50余年里却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震荡与风云。随着“（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范式的急剧更迭与演变，学科的内涵也弥漫了诸多的迷雾与含混，例如当前通用的（也是体制所规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便包含着无法弥合的内在分歧与冲突，并时时引起人们的质疑与询问，因而亟待清理和勘察学科自身的边界和内在规定性。本书尝试从当前学界一个频率相当高的关键词——“现代性”的视野切入，这不仅仅因为如罗岗所说“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而且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本身便构成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当前文学相互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当然这必须对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多元内涵与多种向度加以细致的勘察、梳理与厘定。《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即是致力于这一探索，认为要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必须走出过去绝对化的本质主义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重新理解中国现代

文学之“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建构、启蒙主义的文学叙事、文学的自律性追求和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萌动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多元内涵与多重向度；并且呈现出一个多元共生、异质互动、多方纠缠的生成与建构过程，一个传统被不断改写与重构的过程。承蒙《文艺研究》的厚爱，该文已被允准刊载于该刊2005年第12期，但由于期刊篇幅的限制，作了一些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原本的、也是比较充分的一个文本。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则从人类的现代化（性）运动的宏观背景中切入中国场域，在辨析和探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的视野中进一步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特殊内涵，并进而勾画了从晚清中经民初，再到“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该文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发表后，曾被姜振昌等《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陈方竞《历史、现状、趋向：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和谢昭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审视》（《淮北煤炭师范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等文章评介，被严家炎主编的“作家研究文丛4”《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收录。

《承传与变异：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学》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学位论文的结晶，原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副标题是“20世纪初叶中国文学发展论略”。如副标题所示，该文也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发展加以了描述与讨论，但论述的焦点却是文学传统与（“五

四”)新文学的承传与变异的过程。它隐含的一个潜在的思考便是对当时(以至后来)简单地将新文学与旧(传统)文学对立,甚至割裂开来的倾向的学术回应。

这3篇写作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也显示出我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的艰难掘进。在《承传与变异: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学》中,我虽然致力于探讨(“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或者说文学传统)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仅仅是在新/旧,传统文学/新文学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探讨,所以最终仍然只能朴素地得出“现代(性)”的中国文学正是这一承传与变异过程生成的结晶的结论,这种“现代(性)”仍然只能模糊地以区别于旧(传统)文学的“新”来界定。《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引入了“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并力图从人类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性)的宏大背景中来透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因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殊内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不过由于当时仅着眼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这一历史段落,因此只是提出了一个框架,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实际不够。《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则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作为思考“现代性”的具体语境(当然社会、历史、文化乃至经济、教育等因素作为远景已渗透到这一语境中),视野也就相应扩展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可以比较切实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及其内在张力与机制。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追溯自己学术沉思的历程,是因为也许它能从或一侧面显示了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研究的历史足迹;同时也为拟同样从“现代性”视野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友提供某种可资参照的路径、经验与教训。

本书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透视,通俗地讲,就是文学史研究,包括第二个单元的8篇文章。文学史有多种写法,实际上根源于作者不同的文学史观与不同的史学建

构。过去通行的是一个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再加作家作品（又按大小分章节）的模式。姑且不论这种分期是否合理，仅仅就这种体例来看，将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等机械地分割开来，就未能真实反映现代文学的实际进程与历史面貌。实际上文学思潮与流派是通过具体的作家的思想与艺术追求和作品的艺术个性与风格来体现的，而作家作品也只有纳入到文学思潮流派等文学史框架中才能更深刻地显示其文学史意义与地位。直接面对文学市场的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文学的中介性机构（如报纸、杂志、出版社、文学社团）与生产机制（包括各种文学组织，如文学社团、文学运动、学校等体制性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寻求一种以文学运动、思潮（包括创作潮流）、流派、类型乃至作家的风格、个性、文体等文学现象作为描述文学历史演变的“关键词”便成为一种十分诱人的学术探索，甚至可以说由此构成了文学史不同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历史学科的基本范畴。本书第二单元便是这一方法的一种尝试，力图从文学运动（如《晚清文学革新的现代性》）、文学思潮（包括创作潮流，如《1940年代的文化反思小说潮》、《建国初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文学流派（如《“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风格与流衍》）、文学类型（如《“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文体（如《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与意义》）等“关键词”的解读，来构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史。当然对一个时期（特别是一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时期）和有重大文学史意义（甚至成为一个时期文学发展趋势界标）的作家的解读仍然是文学史写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本单元的另外两篇文章《“民初文学”论》和《王朔现象：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大众文化（文学）的崛起》也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这些解读连接起来，又从或一层面（角度、向度、侧面）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

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与节奏。文学史建构是一项十分宏大的工程，除了应贯注统一的文学理念外，还要进行文学的分期，时期的架构，前后左右的呼应顾盼，寻踪觅流，察微识变，这些都是在一个小小的篇幅内难以胜任的，因而本单元只能是以一斑而窥全豹。不过笔者已在另一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 1898~198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作了一些尝试，有兴趣的师友可以一阅。

本单元的文章也大多先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和《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过。其中《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与意义》（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 年第 2 期）被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黄爱华的《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郭彬的《郁达夫研究述评》（《文教资料》2000 年第 6 期）等文评介，又被侯丽华的《对郁达夫初期创作的叙事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 年第 4 期）等文引用。《“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9 期）被杨剑龙等人的《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东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等文评介，又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当代文学文摘卡》等摘录，并被评为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3 年 4 月）。《“民初文学”论》（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也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报刊摘录。该文与《“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风格与流衍》一样，论述的都是过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相对薄弱、却又比较重要的环节。

本书第三个主题是鲁迅透视，也就是鲁迅研究，包括第三个单元的 6 篇文章。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狂人日记》不仅是鲁迅小说的总纲，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确立的标志，同时《狂人日记》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也是空前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它的正确理解正是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门槛的有效途径。因而本单元有3篇文章集中于《狂人日记》的探讨。《两个世界的隔膜和对立：狂人由疯狂到康复的记录》写作于1988年，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5、6期，也可以说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如题目所示，该文通过“战士”说与“疯子”说的争论，着眼于狂人由疯狂到康复的精神变迁，论述的焦点在于挖掘“狂人”与“常人”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与价值）的隔膜和对立。后来曹禧修先生进一步拓展为“言说的双主体”的话语与结构（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曹禧修文）。《从贾宝玉到狂人：对人的发现与思考》也如题目所示，意在发掘狂人形象在古代文学中的精神先驱，也可以说是我力图发掘现代文学之传统渊源的一个部分。从贾宝玉到狂人正构成了中国文学（文化）追求人的觉醒与解放潮流的一个精神链条。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又是从现代文学的狂人研究视野切入到了古代文学的贾宝玉研究，在学科的交叉与碰撞中更真切地感受与把握到贾宝玉形象的现代精神及其个性特征。因而当它以《贾宝玉：狂人形象的精神先驱》为题，在《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以后，被尤海燕的《20世纪贾宝玉研究综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评介，为张剑锋的《凝重的孤寂感——论贾宝玉》（《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辑）等引用。《〈狂人日记〉再探讨：奴才，还是启蒙先驱？》（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3期）则是对学界推出的《狂人日记》研究的最新成果——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的学术回应，当然这种“再探讨”，也可以看作我对《狂人日记》学术

探索的深化与沉淀。在对狂人由疯狂到康复（即所谓的“复归”/投降/倒退）的精神历程的辨正中对狂人形象的悲剧意义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隐含着作家对新文化运动的悲剧性思考和对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困境的深刻洞察”；同时还深入到《狂人日记》独特的文本构成，较细致地探讨了由“（文言）小序”/“（白话）日记”相互对峙又相互作用、由“余”/“我”的双重叙述展开双重否定的双重第一人称叙事结构，清理了在这一焦点问题上的诸多迷雾。

《鲁迅〈呐喊〉〈彷徨〉的主题结构与思想蕴含》（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则是立足于启蒙现代性的视野（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一个主导性维度）对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作出一个纲领性的解读。其中一些“细节”，如对《阿Q正传》中赵太爷与阿Q精神结构共通性的揭示，也曾受到师友的称赞（李怡等《在发展演化的流变中阅读现代文学的意义》）。《鲁迅思想与艺术中的越文化渊源》（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则力图深入到鲁迅主体思想与艺术方式的内在构成中，去探索过去相对忽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具有发生学意义的越文化渊源。可以说是我力图发掘现代文学之传统渊源的又一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一种区域文学（文化）研究。《〈野草〉的原型与意象》如题目所示，是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切入鲁迅《野草》研究的一种尝试，力图透过《野草》的意象群探讨其潜隐的精神原型，并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深沉的倾向勾连起来。或许是笔者较早作这样的尝试（原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因而为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家平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徐小霞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及在中国的本土化和革新过程》（《社科纵横》

2005年第1期)等评介。

最后一个单元的2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潜)视域”研究。虽然它没有直接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但是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潜)视域。实际上这种并未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潜)视域”却常常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含量的宽广度、厚重度和学术穿透力的力度与强度,因而我也想尝试性地建构自己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潜)视域”。这两篇文章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其中《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演变》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发表后也曾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2期)摘录。

是为序。

CONTENTS

目 录

- 001 自 序
- 001 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
- 020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
- 041 承传与变异：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学
- 056 晚清文学革新的现代性
- 068 “民初文学”论
- 083 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与意义
- 091 “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风格与流衍
- 106 1940 年代的文化反思小说潮
- 125 “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 139 建国初期的农村题材小说
- 150 王朔现象：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大众文化（文学）的崛起
- 158 两个世界的隔膜和对立：狂人由疯狂到康复的记录

- 166 从贾宝玉到狂人：对人的发现与思考
- 181 《狂人日记》再探讨：奴才，还是启蒙先驱？
- 193 鲁迅《呐喊》《彷徨》的主题结构与思想蕴含
- 212 鲁迅思想与艺术中的越文化渊源
- 228 《野草》的原型与意象
- 236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演变
- 252 中西悲剧艺术之比较与中国悲剧艺术的发展
- 264 后 记

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

李杨在一篇题为《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①的论文中，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所谓“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知识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并从许志英先生“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谈起，在细致地梳理和追溯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新文学”等概念以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后，指出“今天的文学史家已经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转变为‘文学史分期’这样的技术问题，仿佛他们讨论的只是现代文学而不是‘现代文学’。然而，这个被用来整合20世纪文学的‘现代文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时间’概念。”“按照这一叙述，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于‘五四’，‘现代文学’的本质定义为五四文学所确立，这样，一个时期的文学是不是属于‘现代文学’，取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坚持还是违背了五四确立的这一文学精神。”不过这种由胡适、周作人等所定义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却并不能概括和包容“当代文学”，即“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人的文学’”的“五四”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并不能概括与包容认同“阶级”或“民族国家”的30年代“左翼文学”和“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和矛盾性。的确，面对这一状况，如果轻易地为“当代文学”讨“一个说法”，指称当前或当下的文学，将目前属于“当代文学”范畴的“50~70年代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后

^① 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新时期文学”统统划归“现代文学”^①，很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重复“当代文学”压抑“现代文学”的历史悲剧，遮蔽和压抑本来也应该作为现代文学的历史向度和既有内涵的“当代文学”。所以“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当代文学’的存在将有力地质疑‘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但是这两个如此对立冲突的概念却组合成一个整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赫然作为目前我们这个学科规范的名称。其实在它完整统一的表象后面其内在的危机与冲突却时时地弥散出来，质疑和动摇着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合法性。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许志英先生等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还是李杨先生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探讨，都建立在原来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内在冲突与紧张的基础之上，都从不同向度质疑了现在使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恰恰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根基，因而亟待加以重新的审视与清理。

吊诡的是，李杨一方面尖锐地揭露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又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根本就没有‘离开’五四”，当然这主要是建立在他对“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文学观思维方式同一性的发现的基础之上。的确无论是“革命文学/反革命文学”、“旧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还是“上层阶级文学/民间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内涵发生了变异，但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旧文学”、“文言/白话”、“人的文学/非人的文学”的改写与重复，都源于一种“以二元对立方法建构主体性的思

^① 参见陈思和先生《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郅元宝先生《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

维方式”。正是这种建立在线性历史进化观基础之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文学发展与理论的偏至”。前面说到，李杨认为，所谓“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知识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建构本身也成为了文学历史事实的一个部分。随着“新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延安文学（工农兵文学）”、“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延续与超越，其本身既是对于现代文学建构的历史更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实实在在的实践展开。这些文学观念都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场域之中，一方面编织起中国现代以来急剧动荡变化的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改写和更换着现代文学的版图与面貌。从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到20年代末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打倒资产阶级的“五四”，建立无产阶级的“五四”，打倒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均，张扬一种叫喊的、口号的普罗文学；再到延安文学整风运动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又到新中国建立后一次次的文艺思想斗争，文学在激烈的颠覆与动荡中越来越纯化，也越来越窄化，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而且这一时期鲁迅也已经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最后终于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的自我毁灭。这里固然有一个文学为反革命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利用的问题，但是撇开各种急剧变化的文学的具体内涵，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却呈现出某种同一性：一方面是追新逐异的进化论的线性历史逻辑，越新就越好，越进步；另一方面则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与斗争的哲学，非要将对方便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原因或许是后发现代化的焦虑，“中国所想象和追随的‘西方’，与现实中的西方，总是

存在着‘时间差’”^①——正是这种始终存在的时间差，导致中国现代知识界总是弥漫着一种“追赶的焦虑”，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化的确是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断地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不断地在对“新”的追逐中形成一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尊、独步天下的霸权主义的态度，形成一种将“新”简单地等同于“进步”的绝对化的本质主义理念。实际上每一种文学的出现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它历史的局限性，如果缺乏对自身的洞见，把自己绝对化起来，无疑只能是一种盲视的文学、狭隘的文学。同样，“新”也并不就一定意味着进步，“新”常常带来发展，带来进步，但有时也会带来倒退与灾难。“文革”文学就是一例。进一步看，发展与倒退、进步与灾难也是复杂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兵文学对于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和激励民族解放意识和精神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历史进入和平年代以后继续袭用这套规范和机制来发展文学，便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在我们今天重建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仍然将学科合法性的根基建立在这样一种绝对化的本质主义的理念上，无疑将重陷当年的历史泥潭。

实际上，文学的发展常常并不是“新”与“旧”的简单代替过程，而是过去与现在复杂的变易过程。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多重复杂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演变，而且是中西文明与文学的融合与创新，是从植根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学向建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跨越。因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纠缠，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现代社会和文学机制与体制的新型空间，现代性的人生体验等等都渗入

^① 郭沫若：《编辑余谈》，《创作》季刊第一卷第2期，1922年8月。